

试论融合进程中的菲律宾华文教育

姜兴山

(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万隆会议”后, 中国政府调整华侨政策, 鼓励海外华侨融入当地社会。菲律宾马科斯执政时期, 基于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 放宽入籍条件, 大批华侨转为菲公民逐渐融入到“大社会”中。在此期间, 作为保持民族属性的华文教育不断受到冲击, 最终导致根本性变迁。当前形势下, 菲律宾华文教育要合理定位, 从华人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出发, 才有前景和未来。关于华文教育传承与融合的研究, 可以为今后海外华文教育及汉语国际推广提供借鉴。

关键词: 菲律宾; 华文教育; 传承; 融合; 变迁

中图分类号: G40-05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4)01-0160-07

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 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 中国政府鼓励海外华侨与居住国人民和平相处, 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并提倡学习本土文化。随着菲律宾政府制定“回归亚洲”的外交政策, 马科斯总统主张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实行对华侨的同化政策, 并利用本地华人推动国家经济建设。为此, 菲政府放宽入籍条件, 大批华侨成为菲律宾公民, 也缓解了“菲化运动”带来的生存危机。这些因素加速了华侨与当地社会的融合, 也直接影响到了华文教育的走向。在教育菲化的制约下, 菲律宾的华文教育宗旨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华人融入到菲律宾社会, 华文教育将如何发展, 必须做出理性的选择。国内学术界研究菲律宾华侨华人的成果很多, 但涉及华文教育的文章还较少, 尤其是融合进程中的华文教育变迁的内容就更少, 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做一论述。^①

一、华人族群加速融合的有力因素

西班牙殖民统治菲律宾后, 极力招徕华侨建设这片新殖民地。而此时明朝隆庆皇帝解除海禁, 大批中国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怀揣“淘金梦”来到菲律宾, 使这里的华侨迅速增多。但美国成为菲律宾新的宗主国后, 把排华法案延伸至菲律宾, 使往来菲律宾的中国人受到限制。菲律宾独立后, 马科斯政府改善华侨政策, 促进了华人族群融入到当地社会中。

(一) 华人族群由流动性向定居性转变

从历史上看, 早期移居菲律宾的华人族群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主观上是由于当时的菲律宾政治、经济和文化还较为落后, 加上“大汉族主义”观念的优越感, 使中国人不愿定居菲岛, 更不想让子孙后代变成“番仔”。客观上菲律宾华侨饱受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歧视, 使来到这里的中国人除钱财之外, 很少有所依恋。因此, 华

收稿日期: 2013-10-10

作者简介: 姜兴山(1969—), 男, 黑龙江佳木斯人, 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海外华文教育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

① 有关菲律宾华文教育的文章主要有: 施雪琴《论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南洋问题研究》1996年第1期; 蓝小玲《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与改革》,《海外华文教育》1996年第2期; 何培基《菲律宾华校华文教育之考察》,《海外华文教育》1998年第2期; 沈红芳《菲律宾华校的嬗变及其诱因探悉》,《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吴端阳《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历史演变及其振兴对策初探》1996年; 罗庆铭《华人企业家与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海外华文教育》1996年第2期; 温广益《菲律宾华人重振华文教育》,《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增刊; 潘露莉《菲律宾华人的属性认同与菲律宾华人教育》,《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章石芳《论转型时期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朱焕之《浅谈菲律宾华文教育的潜在危机和解决策略》,《科教文汇》2010年第12期; 张念、张世涛《菲律宾华文教育三十年困境的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颜长城《发展中的菲律宾华文教育》,《教育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

侨胼手胝足、辛勤劳作,积攒了一定的收入便返回家乡改善家境。有些华侨即便劳作到了老年,也要回家颐养天年,绝不愿客死他乡。由于华侨的频繁往返与交替更新,使华侨新移民的数量占据很大的比例,也决定了华人族群的流动属性。

美国占领菲律宾后,殖民者标榜“法制”和“民治”,大力发展公办教育,对于私立学校教育也予以支持。^① 华侨享有与菲律宾人同等开办学校的权利,华侨学校纷纷创办,华文教育由此发轫。美国殖民者取消华侨“甲必丹制”,在马尼拉设立了中国领事馆。1904年,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成立。广大华侨的教育、经济及其他合法权益有了一定的保障,对华侨社会的稳定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经马尼拉中华商会的请求,菲律宾自治政府允许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难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来菲避难,有5656名中国妇孺来到菲律宾。^② 这其中大部分是在菲华侨的家属,华侨土生人口的繁衍得以加快,华裔青少年的数量迅速增加,华侨社会“易同化”群体不断扩大,为融入当地注入了催化剂。1950年以后,除了政府官员外,能够来菲的中国人只限于短期的游客、教师、留学生及预聘雇员,菲律宾不再允许所谓中国“新客”入境。由于往来于中菲之间的华侨越来越少,菲律宾华侨社会由流动性转为定居性。

(二) 中国政府华侨政策的改变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印(尼)两国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中国政府取消了华侨“双重国籍”政策(即根据本人意愿选择了一个国籍就自动丧失另一个国籍),鼓励华侨融入当地社会。以后凡涉及海外华侨国籍问题,中国政府均遵循上述原则。

在此之前,对于在菲律宾出生的华裔青年来说,他们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活,改变国籍并不是难事。可对于从中国来此的“新客”,转变国家认同却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这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忠”、“孝”等伦理。放弃泱泱大国中国的国籍,取得菲律宾小邦的公民身份,总会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在中国政府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的情况下,减轻了华侨的心理压力和道义负担。此时的菲律宾华侨社会正以“新客”为主,并受到汹涌澎湃的菲化浪潮冲击,处在内外交困的境况。侨社抗争零售商菲化案出师不利,使众多华侨失去维持生计的饭碗。虽然台湾“驻菲大使馆”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台湾政治的不确定性,护侨工作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③ 于是,许多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开始主动加入当地国籍,以此缓解“菲化运动”带来的生存危机。他们一改过去树高千尺、落叶归根的想法,重新确立了路向,将侨居地变为自己的“家”,主动融入主流社会!^④

(三) “入籍法”对华侨融合的推进

1973年,菲律宾政府提出“多极”的外交政策,摆脱遵循美国的外交轨道。马科斯政府积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华侨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加快华侨融入到主流社会当中。马科斯肯定了华侨对菲律宾国家建设的贡献,希望在菲律宾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角色。^⑤ 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变过去那种排斥华侨的政策,同时提高华人对菲律宾国家的认同感。对于他们而言,要承担当地权利和义务,关键问题是给予华侨以菲律宾公民身份。^⑥

1975年4月11日,菲律宾政府发布了第270号令,放宽外侨入籍条件,简化外侨入籍程序。^⑦ 1976年12月3日,菲律宾政府颁布了第836号令,对入籍条件与资格再次放宽,同时解

① 教育调查理事会《菲律宾群岛教育体制调查》(The Board of Educational Survey, A Survey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马尼拉:印书局,1925年,第505页。

②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七十周年特刊》,马尼拉:岷里拉中华商会,1974年,第29-30页。

③ Teresita Ang See,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Social Changes in the Post WWII Philippine - Chinese Community," in Teresita Ang See,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 Perspectives, Vol. 1, Manila: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1997, p. 4.

④ 方人也《菲华社会的转变和路向》,《第十届世界华商大会》,马尼拉:菲华商联总会,2009年,第56页。

⑤ 《南洋文摘》,第七卷,第12期,第813页。

⑥ Theresa C. Carino, "State Ideology, Policies and Ethnic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in Teresita Ang See and Go Bon Juan, eds., The Ethnic Chines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ing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Manila: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1994, p. 153.

⑦ 《联合日报》,菲律宾马尼拉,1975年4月22日、23日。

决入籍的华人妻子、儿女的国籍问题。1976年12月29日,菲律宾政府又发布了第491号总统令,进一步对入籍条件进行简化。这三项法令加速了华侨融入菲律宾社会的进程,是华人历史的转折点。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华侨来说,阻碍他们进入菲社会的大绊脚石被搬开了,对新“祖国”的忠诚誓言是发自内心的。^①一位著名的菲律宾评论家就阐述“实际上,大部分在菲律宾出生的华侨都热切渴望归化为菲籍,纳入菲国社会的洪流,但归化法规繁琐而苛刻,使许多华侨望而兴叹。他们送其子女进入华侨学校,希望增长智慧和技能,有朝一日不能在菲永久居留时有所倚靠。”^②这三项法律使华侨逐步走向菲律宾化,并为其融入主流社会创造了客观条件。

(四) 华侨社会处境的改善

美国殖民统治期间,为扶助当地人经济,实施排斥华侨的菲化政策。菲律宾独立后,沿袭了这种消极“遗产”,华侨处于艰难的生存境地。马科斯就任总统后,尤其重视华侨在发展菲律宾经济的作用,取缔歧视华侨的政策,华侨终于走出遭受歧视的阴霾。他曾指出“菲律宾只能有一种公民。将公民分成两等,不合天主教的精神。”^③马科斯还鼓励华侨从事菲律宾薄弱的工业、金融等领域,对华侨经济的转型起到了促进作用。有些华侨企业打破以传统的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组织方式,引入国际资金和经营理念,使华侨经济得到飞速发展。

菲律宾华侨长期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加上“过客心态”,使他们对当地政治不抱任何希望。虽然华侨不愿意参与当地的政治,而菲律宾当局却屡找他们的“麻烦”。为此,入籍后的华人也有意识地参与政治活动。中国政府采取谨慎和不卷入当地华人事务的立场,使华人意识到其生存必须依赖于菲律宾,他们同当地社会是密不可分的。^④许多华侨在获得了国籍的权利后,即把菲律宾作为自己的祖国,而中国只是自己的祖

籍国。命运多舛的菲律宾华人,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菲律宾的社会和各项活动。

商总带领华社也努力推进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增进菲华民族的理解与友谊。如放弃利润平抑米价,帮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⑤支持增税政策和节约运动,这些行动都受到马科斯的赞扬。^⑥商总还出面与政府协商,废除了蔬菜、报业和银行等领域的菲化案。华人社会还特别关注慈善事业,对防治传染病、消防救灾、风灾水灾、火山喷发等灾害进行救助,这些举措赢得了菲律宾人对华人的好感。华社与主流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强,菲政府更加关注华人社会的发展,平等对待华人族群,使他们加速融入到菲律宾社会中。

二、华文教育的调和与适应

华人社会与主流社会的融合过程中,文化碰撞与融合也在进行,特别是在教育菲化之后,华文教育体制和目标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于华人社会维系文化特质是严峻的挑战。华文教育也根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华文教育内容,保持华人文化的同时,也适应华人社会自身的发展。

(一) 华文教育对华人族群的重要性

在通常情况下,华人族群移居海外,出于文化习俗、宗亲观念和守望互助的需要,往往倾向于聚集居住。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普遍,如国外的唐人街就是华人在海外的“小社会”。西班牙殖民统治菲律宾时期,华侨大部分聚集在马尼拉的“八连”(Parian)内居住,这使华侨仍能保持中华文化的传统,守护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在华侨社区内,无论街头景观,还是生活方式,中国文化的影子随处可见。华侨的宗亲意识相对较浓,华文教育成为他们的文化堡垒。如果没有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就会逐渐被菲律宾化,我们从混血儿“密斯蒂佐”可窥见一斑。

“密斯蒂佐”(Chinese Mestizo)是菲律宾华侨与当地民族通婚繁衍的后代。^⑦早期移居菲律

① Teresita Ang See, "Changing View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Some Observations," in Teresita Ang Se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Vol. 1, Manila: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1997, p. 112.

② Jo Villarba, "Chinese Schools in the Philippines," in Examiner, January 16, 1966, p. 28.

③ 陈烈甫《马可仕统治下的菲律宾》,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05页。

④ Teresita Ang See,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Social Changes in the Post WWII Philippine - Chinese Community," in Teresita Ang See,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 Perspectives, Vol. 1, Manila: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1997, pp. 2-3.

⑤ Daily Exoress, February 26, 1974, p. 4.

⑥ "Traders to Stabilize Prices," in Daily Express, February 26, 1974, p. 1.

⑦ 陈守国《华人混血儿与菲律宾民族的形成》,吴文焕译,马尼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1989年版,第6页。

宾多是华侨商人, 由于贸易的繁荣和经商的需要, 有些华侨渐渐定居下来。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和迁移条件的限制, 华侨商旅极少携带女性来到菲岛定居。有些华侨来菲久居不归, 便有与当地通婚现象。另外, 西班牙为维护殖民统治, 利用宗教来改变华侨的信仰, 鼓励华侨与土著教徒通婚, 极力使华侨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这种情况下, 华侨与菲人通婚的现象已越来越普遍。

20 世纪初, “密斯蒂佐” 成为菲律宾社会最有实力的中坚阶层, 他们在菲岛出生和成长, 并接受当地的文化教育, 他们在国家认同上毫无疑问地倾向于当地。有些“密斯蒂佐” 已经历几代的繁衍, 对“祖籍国” 概念非常模糊, 有些会因为中国的贫弱而羞于承认自己与中国“有关”, 甚至有的还成为排斥华侨的“精英”。菲国父何塞·黎刹就是一个“密斯蒂佐”, 但他称自己为马来族, 至死不承认有华人血统。^① 如果“密斯蒂佐” 自幼接受中国教育, 那么将来长大便会成为地道的中国人。相反, 他们过菲人的生活, 一切思想和观念都菲化了。缺少中华文化的熏陶, 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产生藐视之心, 最终丧失了中华文化的实质部分。应该说, “密斯蒂佐” 不是特殊的菲律宾华人, 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菲人。^②

族群文化是一个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而来的, 是这个民族得以维系和生存的基础, 而教育是保留文化领地的最重要武器。海外华侨既有保存传统的中国化的一面, 又有为适应生存环境而“非中国化” 的二重性。许多海外华侨无论政治倾向如何, 还是不计代价地捍卫对子女的华文教育。他们所怀的希望只有一个, 那就是子孙后代能够保留华人特性, 并牢记是中国人的后裔。^③

(二) 华文教育环境的改变

在教育菲化浪潮的蔓延下, 麦格赛赛政府把

菲化目标对准了华文教育领域。此后, 菲政府提出种种限制措施, 制约华文教育的发展, 最终华文教育被菲化。菲化后的中文课程授课时间大幅度缩减, 华侨学校中文课程小学每周 800 - 870 分钟, 中学 900 - 1000 分钟。^④ 中文课程大量减少, 英文、自然科学和艺术类课程大量增加, 华文教育逐渐被轻视。

马卡帕加尔执政后, “菲化运动” 趋于缓和, 华侨生活较为安定, 经济快速发展。然而, 华侨社会对华文教育的资金投入却越来越少。商业气息掩盖了文化氛围, 华文教师的薪金普遍较低, 甚至被视为是一种没有前途的职业, 很少有人愿做华文教师而选择就读中文教育系。^⑤ 许多教师纷纷弃教从商, 尤其是受过专业培养的教师。以华侨师范专科学校为例, 从创立到合并到中正学院, 培养出大约 300 余名的华文教师, 最终大多数转行, 对于华文教育影响是巨大的, 这也是制约华文教育发展的另一因素。^⑥

华侨希望子女通过华文教育获得知识, 提高谋生的技能和本领。他们发现, 华人族群在融入菲律宾社会的过程中, 教育需求更接近于主流社会。所以, 有许多家长把子女送入菲校读书。新一代的华裔青年与中华文化日渐疏远, 对祖籍地的感情也逐渐淡化。相比之下, 他们的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价值取向却趋于本地化, 他们更加关心当地的生存和以后的发展, 华文的使用范围只局限于华人社会。菲律宾华裔青年说英语、菲语成为时尚, “华文无用论” 成为不争的事实, 这对华文教育的发展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自我腐蚀” 所起的作用, 甚至比外界或人为的限制和破坏要更为深远。^⑦

(三) 华人社会文化的变迁

战后在菲律宾出生的华裔青年逐渐成为华人社会的中流砥柱。由于历史原因, 他们几乎都是在菲律宾长大的。对于中国社会他们很少或根本

① 洪玉华、吴文煊 《华人与菲律宾革命》, 马尼拉: 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 1996 年版, 第 5 页。

② 施雪琴 《中菲混血儿认同观的形成: 历史与文化的思考》, 《南洋问题研究》2000 年第 1 期, 第 46 页。

③ Teresita Ang See,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Social Changes in the Post WWII Philippine - Chinese Community,” in Teresita Ang See,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 Perspectives, Vol. 1, Manila: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1997, p. 5.

④ 《菲律宾华文教育综合年鉴》, 马尼拉: 菲律宾华教中心出版, 2008 年, 第 118 页。

⑤ 李宏谋 《提高教师待遇, 挽救华文教育》 // 《菲律宾华校华语教学研讨会资料汇编》, 马尼拉: 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 1993 年, 第 90 页。

⑥ 卜克 《团结、改革, 才有出路》 // 《华文教育言论集》, 马尼拉: 菲律宾各宗亲会联合会, 1993 年, 第 2 页。

⑦ 周南京著、吴文煊编 《菲律宾与华人》, 马尼拉: 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 1993 年, 第 291 页。

没有直观的印象,他们认为菲律宾才是自己的故乡。在充当“边缘人”和饱受失落感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后,允许加入菲律宾国籍为他们认同于当地社会扫清了道路。1973年,50万华人中有85%的人口出生在菲律宾,这些人口中95%的年龄低于25岁。在过去的1/4世纪中,第三代华裔出现在菲律宾历史舞台。^①如果是第二代华裔还有身居异域的艰难困苦,以及成为菲律宾公民后的彷徨和困惑,那么第三代华裔则完全适应了菲律宾的生活。

华人族群政治认同的变化,是整个华人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变化,同时还是推动其他认同变化的主要动力。菲律宾政府准许华侨集体转籍,最大的目的亦即争取这份认同。^②菲律宾华人文化是由华侨文化转化而来的,而华侨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海外延伸。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下,移居菲律宾的华人为了生存和繁衍,必须顺应社会现实的潮流,走与当地主流文化融合发展的道路。菲律宾族群之间的政治环境平等的,不同民族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在“多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体”的框架。华人族群与土著民族的关系朝着日益和睦的方向发展,文化的融合也与之同步前行。

中菲建交以后,华人社会最深刻的变化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演变,尤其是本地出生的华裔青年单纯从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日常的风俗习惯等方面来看,已经很难区分谁是华人,谁是菲律宾土著。许多华人有用菲律宾文起的名字或用西班牙文起的名字,但往往在这些名字后面还加上其中国姓。在着装方面,大多数华人喜欢穿菲律宾式的服装。在家具方面,王彬街以外的华人与菲律宾人家庭已经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摆放布局上略有不同。在饮食方面,多数华人家庭都雇菲律宾女佣做饭,除了华人家庭主妇做中国菜以

外,中国餐馆就算是这部分中国文化的唯一陈列室了。^③制作中式点心的华人饭店,已放弃原来的经营品种而出售快餐包、松软馅饼之类的食品。现在年轻人喜欢汉堡包和可口可乐胜于包子和中国菜。^④菲律宾华人的风俗习惯逐渐“菲律宾化”了,尤其在生日、婚姻和丧事礼仪方面,菲律宾习俗明显成为主流。

三、华文教育的定位与走向

在华侨社会过渡到了华人社会的过程中,作为保持民族属性重要要素的华文教育也时过境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面对新形势,华文教育既要为华人社会提供服务,又要适应菲律宾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当地社会培养人才。为此,华文教育定位准确也是关键问题。纵观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华文教育只有正视华人的现实和生存的实际,遵循客观规律,才有发展的前景和未来。

(一) 华文教育要去政治化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借助中国大陆与菲律宾的“阻隔”,通过扶助菲律宾华文教育,来达到控制华侨社会的目的。台湾当局还怂恿菲政府以镇压“虎克”共产党为借口,打击菲律宾华侨社会的亲共势力,造成了广大华人的困惑和纷争。^⑤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也指责台湾当局利用华文教育实现,实现对当地华侨国家认同的掌控,认为是造成菲华社会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始作俑者”,一个“政党”在本国的存在愈加令其难以忍受。^⑥私立学校局长杰西·佩皮尼安(Jesus Perpinan)指出,菲律宾教育机构并不是反对学习华文,而是反对培养对菲律宾国家的不忠诚。^⑦华文教育的发展夹杂了政治因素,不仅使海外华侨深感痛苦,也导致了菲政府疑虑和不安,并成为华校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说,菲律宾华人社会必须以华人的共同利益为准则,摒弃

① Antonio S. Tan, *Changing Identity among the Philippine Chinese, 1946-1984*,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ustralia, June 14-16, 1985, p. 15.

② 施振民《文化与政治认同》//洪玉华、蔡丽丽《十字街头》,马尼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1988年,第25页。

③ 杰拉尔德·麦克贝斯《菲律宾华人的政治融合》,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南亚及东南亚研究中心,1973年,第108页。

④ 德里西塔·昂·西《融合和认同:二次大战之后菲律宾华人社会的社会变化》,《南洋问题研究》,1989年3期,第60页。

⑤ Teresita Ang See and Lily T. Chua, eds., *Crossroads: Short Essays on the Chinese Filipinos*, Manila: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1988, p. 5.

⑥ Antonio S. Tan, *Changing Identity among the Philippine Chinese, 1946-1984*,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ustralia, June 14-16, 1985, p. 13.

⑦ Santos G. Mena, S.J., *Lucent Lux: The story of Xavier school, Vol. I, The Desautels Years (1956-1967)*, Manila: kadena Press Foundation, Inc., 2005, p. 238.

政治影响,使华人社会成为菲律宾大社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①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的传统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日益突出。在汉语国际推广战略中,要符合海外华人所在国的文化土壤和教育环境,尤其不应把华人当作华侨来对待,否则会造成华人的反感。因此,避免在华人社会越俎代庖,“大操大办”华文教育。以华文教育师资的“输血变为造血”,加大本土化培育师资力度。菲律宾华人较多,华文教育仍十分敏感,教育菲化政策还在约束华文教育。如果中国政府援助的汉语推广宣传太浓,容易引起对方怀疑有政治目的,这将得不偿失。华文教育不仅局限于华人社会,还要扩展至主流社会,让更多当地青年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不断提升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感染力,营造华文教育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

(二) 华文教育与华人的生存结合

华侨生活在异国他乡,只有知晓本土文化才能适应社会,才能融入主流社会。历史发展证明,接受居留地教育,是民族融合的前提条件,是与当地土著居民和平相处的重要因素。菲律宾教育菲化前,华文教育宗旨是培养华侨具有中华文化特质和中华民族意识,并拥有祖国观念的中国公民。华侨学校无论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是按照国内模式创办的,华侨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海外延伸。教育菲化后,华文教育的目标、体制和内容都发生变化,是菲律宾教育的组成部分。因此,华人的利益和这个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华文教育必须兼顾菲律宾的国情、社情和政情,并作为菲律宾民族语文和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在菲律宾存在和发展。^② 华文教育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了教育结构和内容,传授华人学生现代知识和培养实践技能,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

中华文化是海外华人得以存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智慧源泉。菲律宾华文教育应以融合主流社会为主线,把华人的生存作为前提,走本土化

教育的道路的同时,继续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本土化不意味着全盘菲化,传承也不是排斥菲律宾文化。使华文教育成为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文化,推动华人族群为菲律宾社会更好地服务。同时,华文教育不单纯是学校教育,也包括报刊、图书、传媒等社会教育。在调整华校华文教育的定位之后,社会教育也要与之辅助进行,呈现多样性的教育手段,协调配合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来共同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和前进。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没有长效的规划,对华文教育“有心人”无财力,而有财力者未必用心于教育。华人社会所谓的重视华文教育只是“呼吁”而已,华文教育在广大华人的叹息中逐步衰弱,甚至许多人把原因归咎于“菲化运动”,这是极其片面的和不客观的。华人社会要正视华文教育对华人族群的价值,中华文化蕴含的优良传统和伦理道德是华人发展的源泉。菲律宾社会已趋于多元化,华文教育应顺应潮流更趋开放,并且要坚持以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③ 因此说,菲律宾华人社会是在融合中发展,在发展中优化,才是理性和实际的抉择。

(三) 华文教育要为社会服务

在菲华融合进程中,华文教育不单具有民族性,更要有社会性。要把民族性和社会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为菲律宾社会服务。教育菲化后,华校已是教授华文的菲校了,菲籍学生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个别“山顶州府”的华校,绝大多数是纯菲人血统的学生。许多华校教育质量都优越菲校,华校已经成为菲律宾教育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④ 既然华校的学生主要是菲人,那么菲政府给予华校与菲人私立学校平等的法律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争取菲政府把华文教育纳入法律体系范畴内保护,即便没有得到财政上的支持也是十分必要的。在法律上,华校的法律地位仍是菲化案限制的条文。虽然菲政府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但华校的实际法律地位还是受限制的。

^① Victor Go, "Resolve our own destiny," in Teresita Ang See and Lily T. Chua, eds., *Crossroads: Short Essays on the Chinese Filipinos*, Manila: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1988, pp. 150 - 151.

^② 投石 《中华文化与菲律宾人》,《融合 - 菲律宾华人》,马尼拉: 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 1990年,第177页。

^③ 蔡聪妙 《未来社会发展与华教使命》//《春华秋实 - 计顺菲华中学创校四十周年纪念特刊》,计顺: 菲华中学, 2004年,第21页。

^④ Jaime Batnag, "To Close or Not Close the Sino Schools Problem?" *The Philippines Herald Magazine*, May 23, 1964, pp. 24 - 25. in Shubert S. C. Liao, Ed.,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Manila: University of the East, 1964, p. 355.

此外,华校还要解决好董事会和学校行政之间的关系。菲律宾华校大体上分为开放型和闭锁型两种,“山顶州府”的华校属于开放型,马尼拉的华校多数闭锁型。开放型华校是由当地所有华人所拥有,董事会来聘请校长。它的优点是全体华人都热心支持学校,获得的捐助较多。缺点是董事会过于干预学校行政。闭锁型的华校是由少数华人所拥有,董事会不是选举产生,校长则是由董事长推荐。由于这种华校没有向社会公开,也得不到广泛支持和援助,学校有图利的商业化倾向,最终教育水平就会弱化。^①因此,走开放型的道路,面向全社会并处理好董事会和学校行政的关系,是菲律宾华校发展的良好途径。

海外华人社会在政治认同变迁的影响下,其他元素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导致华人文化认同出现复杂性和多样性,华人文化逐渐演变成当地的混合文化。但是,这种变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华人文化彻底失去原有属性,消失在当地文化的海洋中。文化作为华人族群的重要标识,可以感染和振奋一个民族的精神,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过,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华人应当保持自己的民族

特性,决不能一概全盘的否定和抛弃之,否则华人就会失去民族根基,而成为找不到方向的民族。保留中华文化特质就是捍卫中华民族的魂魄,这对于华人移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融合文化和存留固有文化并不矛盾,如果说融合是为了发展,那么保持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多元文化的内涵。华人文化应立足当地,在继承中华文化的同时,又积极与菲律宾本土文化相融合。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曾经强调说“旧的政策是少数民族应同化于国家主流,但新的政策是鼓励少数民族保留其古老文化及生活方式。一个不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骄傲的民族是没有精神的力量,没有根和命运的民族。”^②菲律宾华人为了适应社会环境而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华人自身的语言、习俗、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文化要素都在发生变迁,这是客观发展的结果,文化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华人应带着文明和美德,作为他们对丰富菲律宾人民的文化的持久贡献。^③华人在文化上保持本民族传统和特性的同时,力图促进华人与所在国原住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以达到和谐相处和共同繁荣的目的。

(责任编辑:丁翔)

On Philippines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JIANG Xing-shan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justed the policy towards overseas Chinese and encouraged them to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community after Bandung Conference. For the sak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s,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eased the application for citizenships and a larg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were granted the Philippine citizenship which accelerated their integrating progress into the “mainstream Philippine society” in the reign of Marcos. During this period, overseas education that kept national property was greatly challenged and led to a fundamental vicissitude. In current circumstances, only if the Philippines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s positioned rationally and carried out for the need of Chinese self-development, can it have prospects. References are provided to the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transmiss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Philippines,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Transmission, Integration, Vicissitude

^① Victor Go, “A Second look at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in Teresita Ang See and Lily T. Chua, eds., *Cross-roads: Short Essays on the Chinese Filipinos*, Manila: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1988, pp. 50-52.

^② 邵建寅《中正五年》,马尼拉:菲律宾中正学院校友会出版,2008年版,第21页。

^③ Jesus E. Perpinan, “New controversy over Chinese Schools,” in Shubert S. C. Liao, ed.,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Manila: Printed in the Philippines, 1964, p. 337.